

## 审稿专家意见与作者回应（第五轮）

本文英文摘要、整篇文章的中文水平都极其恶劣。现请所有作者都看看本刊 2023 年第一期中“主编的话”，对自己的稿件做出彻底的修改。请作者注意，如果修改稿依然存在类似的问题，哪怕是一处、两处，我将直接拒稿。

现在举例说明文章的恶劣之处。1，摘要“因此从当局者-旁观者两种视角考察‘亲亲相隐’中道德认知的潜在视角差异”。没有动词。2，“通过 3 个子研究，发现 XXX”。子研究到底怎么做的？加一句话就可以增添许多信息。3，“（3）道德认知分离在当局者视角相对旁观者更低，”。稍微颠倒一下句式就能说清楚的意思，在作者手里变成了如此污浊。4，“该视角差异敏感于错误严重性和社会关系”。完全欧化的说法，也没有说清楚如何“敏感”。5，“其中一个重要问题便是人们在亲近者道德越轨（moral transgression）时的道德认知与反应倾向（Berg et al., 2021; Weidman et al., 2020），这与有着深厚中国文化传统、在本世纪初曾在中国伦理学界引发广泛争论的‘亲亲相隐’问题（见：邓晓芒, 2010a; Guo & Zhang, 2016）是基本一致的。”谁跟谁一致？“一致”又是什么意思？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指出的问题。参照上述意见和《主编的话》，我们邀请 3 位青年教师学者（2 位同领域，1 位外领域）对本文做了逐句校对修订，并经第一作者通篇组织整理后，由通讯作者对稿件质量做最终把关，已经对稿件做出了大幅、彻底的修改，英文摘要也已请第三方机构进行了整体润色，敬请审稿专家再次评阅。

稿件若仍存在问题，还烦请专家向我们进一步指出，以帮助我们改进。

再次感谢审稿专家的辛苦工作！

## 审稿专家意见与作者回应（第四轮）

作者根据建议对图片、统计方式和讨论进行了修改，文章有了较大改进，但针对修改仍有两点建议：

1. 作者在研究一中，把道德判断、道德决策和道德认知分离作为三个不同的因变量进行分析欠妥。因为道德认知是道德判断与道德决策的差异，因此其实体现了 2 认知视角（当局者 vs.旁观者）\*2 行为类型（道德判断 vs.道德决策）的交互作用效应量，所以将三个指标画在同一幅图上并不合适。作者在回应 4 中表示本文关注道德判断与道德决策的差异，因此针对道德认知分离进行统计；但在文中，作者却也对道德判断和道德决策进行了重复分析，不免使读者混淆。

从方便读者理解变量关系的角度来看，建议分析和作图思路为，1) 对 2 认知视角（当局者 vs.旁观者）\*2 行为类型（道德判断 vs.道德决策）进行画图和方差分析，报告主效应和交互作用；2) 使用道德认知分离指标作图，用于进一步给读者阐明上述交互作用的含义，但无需重复进行统计分析，因为该分析结果会与第一点一致。

回应 1：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在本次修改稿中，我们参照意见：（1）在统计分析上，进行认知视角（当局者 vs.旁观者）\*行为类型（道德判断 vs.道德决策）的方差分析，报告了主效应、交互作用（道德认知分离的视角差异）和简单效应（道德判断和道德决策的视角差异）；（2）在作图上，研究一首先基于道德认知分离的视角差异这一简单效应补充阐明了交互作用的统计学意义，然后将道德认知分离另外作图汇报；研究二和研究三则将道德判断、道德决策和道德认知分离的视角差异都分别成图，其中横轴分别为社会关系（研究二）和道德领域（研究三）。

2. 研究二和研究三分析和作图思路建议与研究一一致。另外，研究二为何没有展示道德判断的结果图？三个研究的作图方式建议保持一致。

回应 2：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如回应 1 所言，我们参照意见修改了研究一的作图思路，在交互作用图之外，道德认知分离的视角差异单独作图（此外，因为研究一的行为严重性为连续变量只能做简单斜率检验，所以也单独成图）。而研究二和研究三在实验设计上比研究一都多了一个 3 水平的组间变量（研究二：社会关系，研究三：道德领域），若采用研究一相同的思路，则研究二和研究三则分别要做 2（方差分析图、道德认知分离图）\*3（组间变量 3 水平）=6 张图（全文便有 15 张图，可能太多了）。因此基于研究二和研究三的研究目的，我们没有再单独呈现两因素方差分析图，而只作了道德判断、道德决策、道德认知分离的视角差异各 3 张图，分别都以社会关系和道德领域为横轴。

以上修改请审稿专家审阅是否可行，若有更加有助于我们报告相应结果的统计分析和作图建议，请进一步向我们提出。

## 审稿专家意见与作者回应（第三轮）

经过修改，本文已有较大改进，但在行为和数据分析细节上仍存在问题，修改建议如下：

1. 作者在引言的最后提及了道德认知的理论框架，包含道德决策、道德判断和道德认知分离（Yu et al., 2019），并以此为框架设计研究。建议作者将该框架提前阐述，并根据这一分类详细阐述“亲亲相隐”的研究进展，会更容易作者理解本文的结构和框架。

回应 1：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如正文引言的第一段所呈现，在当前有关“亲亲相隐”的道德认知考察中，研究者主要关注道德判断和道德决策这两个道德认知指标，分别对应于“应不应该举报”和“会不会举报”两个核心问题（卫旭华, 邹意, 2020; Berg, 2021; Soter et al., 2021; Weidman et al., 2020），发现“亲亲相隐”是一种具有跨文化（中、日、美）和道德认知类型（道德判断、道德决策）一致性的基本道德认知倾向。这两个指标是 Yu 等(2019)提出的三维道德认知模型中的两个主要道德认知过程，其第三个道德认知过程是道德推断（moral reasoning），与本研究相去甚远故未被我们纳入考察。

之所以增加了道德认知分离作为第三个道德认知指标，是因为 Soter 等(2021)的研究中发现了道德判断与道德决策之间的分离，即尽管人们在很大程度上认为应当检举亲近者的错误，但报告了相对更低检举亲近者的道德决策意向，袒护亲近者的私心削弱了道德正当性判断对人们道德决策意向的影响。再加上道德判断与道德决策都具有社会关系敏感性，所以融合的道德认知分离（即道德判断与道德决策间的分离程度，以前者减去后者的差值为指标）比之考察单一类型的道德认知能够更准确地把握人们在亲近者违法犯错时的心理冲突，故将其作为第三个道德认知指标进行考察。从正文 3 个研究的结果也可以看出，道德认知分离的视角差异相对另外两个指标更加稳定。

对比来看，若“亲亲相隐”的道德决策描述的是人们对亲近者的整体“保护”意向，那么道德认知分离程度指标所描述的便是人们对亲近者的“袒护”意向，即对亲近者保护意向中出于私心而非道德正当性考量的部分，因此它也可以视为道德决策的第二个指标。在本次修改稿中，我们仍然以道德判断和道德决策为主要道德认知指标，道德认知分离作为道德决策的补充指标（道德认知的第三个指标）。为便于读者理解本文的结构和框架，我们在引言的最后一段补充了纳入道德认知分离作为第三个道德认知指标的说明。

2. 在被试数方面，以研究一为例“根据 G\*Power 的计算，该样本量在  $\alpha = .05$  且  $\text{power} = .80$  的情况下能够查明的效应量  $f^2 = 0.16$ （此处请检查应该是  $f$  还是  $f^2$ ）。该效应量指标与本文结果所报告的  $\eta^2$  不同，难以判断该被试数是否足够。建议作者进一步阐明。

回应 2：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校对了相关错误，并补充了转换后的效应量指标：根据 G\*Power 中灵敏度功效分析（sensitivity power analysis）的计算，该样本量在  $\alpha = .05$

且  $\text{power} = .80$  的情况下能够查明的效应量  $f = .16$  ( $\eta_p^2 = .02$ )，符合小效应的标准。

3. 研究一道德决策和道德判断的问题中，均使用了「应该/会」的说法，但应该做某件事的倾向与实际是否会做某件事的倾向并不一定完全一致，作者如何对此问题进行区分或讨论？

回应 3：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正如我们在回应 1 所言，“应不应该做”和“会不会做”之间的不一致正是我们将道德认知分离作为第三个指标的原因所在，保护亲近者的私心使人们难以在道德决策中完全兑现道德判断中报告的检举正当性（Soter et al., 2021）。根据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在引言最后一段进一步补充说明了考察道德认知分离的原因。

4. 结果部分，图 1 中将道德决策和道德判断分别标为“实然”和“应然”，但文字描述仍使用道德决策和道德判断，读者难以对应。从易于理解和与其他文献相比较的角度，建议图中标注“道德决策”和“道德判断”。另外，纵坐标的“道德认知”过于模糊，应该标注实际测量的因变量名称。“道德认知分离”的指标如何计算，需要阐明。

回应 4：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在本次修改稿中，图注已按照意见做出修改。

对于道德认知分离这一指标，类似于实验组-控制组前后测实验设计，在统计学层面上有 3 种方法进行处理：（1）在同一衡量尺度下，直接计算道德判断和道德决策两个指标间的差值作为指标，从而可以直接基于道德认知视角做  $t$  检验或方差分析；（2）将道德判断和道德决策两个指标作为被试内自变量（道德认知）的两个水平纳入实验设计，以其与道德认知视角做混合实验设计的方差分析，其中的交互作用表征了道德认知分离程度在道德认知视角两个分组间的差异显著性，需要通过简单效应分析对比道德认知分离的视角差异；（3）以道德判断为协变量，直接进行道德决策基于认知视角的协方差分析，此时得到的道德决策的视角差异实质上就是道德认知分离的视角差异。

这 3 种方法下所获得  $F$  值、显著性和效应量都是完全相同的，都描述了道德认知视角对道德认知分离的主效应。为了让读者能够更直观清晰地理解，我们在本次修改稿中统一采用方法（1），即计算道德判断和道德决策的差值作为道德认知分离的直接指标进行分析。

5. 研究二和研究三也请画图阐明结果，图片建议同上。

回应 5：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按照要求补充了图片。

6. 写作规范上， $p$  值均应该保留三位小数并报告具体值，这有助于读者判断不显著的结果是否由于被试量不足导致。如研究一结果中“两种道德认知类型的视角差异都未达到显著性水平（ $ps > .05$ ）”，应该报告具体  $p$  值，以排除边缘显著情况。另外， $\eta^2$  请斜体。

回应 6：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按照要求将所有的  $p$  值均保留三位小数并报告

具体值，订正了相关格式错误。

7. 研究二中“因此，“亲亲相隐”中道德认知的视角差异敏感于社会关系远近”的结论如何得出，请进一步阐明。

回应 7：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在研究二的最后增加了“小结”部分以对相关问题做出阐释：此外，研究二还发现研究一中观测到的视角差异在朋友违法犯错过情况下同样存在，而在社会关系较远的邻居身上则不再显著。这表明“亲亲相隐”的道德认知的视角差异的“亲”可以向外拓展到“亲近者”，但至少止步于社会关系较远的邻居，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亲亲相隐”中道德认知视角差异对社会关系的敏感性。

8. 研究三中，道德领域与认知视角的交互作用显著体现在何处，请作者进一步解释。

回应 8：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在上一轮的稿件中，因为将两个道德认知指标作为一组被试内变量纳入方差分析，所以“道德领域与认知视角的交互作用显著”的因变量应该是“道德判断和道德决策的综合”。这里两者间的交互作用本身并无实际意义，需要将道德判断和道德决策分离开再做分析。当我们分别以道德判断、道德决策和道德认知分离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都没能观测到道德领域与认知视角的交互作用。

因为本次不再采用多因素的复杂方差分析考察“道德认知分离”的视角差异，这一交互作用和研究问题也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没有再汇报这一交互作用。

9. 作者在研究一中计算了“道德认知分离”的指标，但在研究二和研究三中并未使用。请从该分析的必要性和研究间一致性方面考虑，是否仍需计算和统计该指标；如需要，请将三个研究保持一致，以方便读者理解。

回应 9：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正如引言和前文回应中所言，道德判断和道德决策都敏感于社会关系远近，所以对道德决策的考察不应脱离道德判断进行，故而有必要增加融合的道德认知分离作为第三个道德认知指标，这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人们在“亲亲相隐”问题中的心理冲突。从研究结果来看，道德认知分离保持了相对道德判断和道德决策两个指标而言更加稳定的视角差异。因此，我们在本次修改稿中修改了核心效应的统计处理方法后保留了这一指标，并按照意见将三个研究的指标保持一致。

10. 前言和讨论部分，道德认知分离与道德伪善密切相关，因此建议增加这类研究的综述和讨论。

回应 10：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正如我们在回应 1 中所言，道德认知分离程度指标所描述的是人们对亲近者的“袒护”意向，即对亲近者保护意向中出于私心而非道德正当性考量的部分。但考虑到“亲亲相隐”仍是一个充满激烈争论的议题，这种“私心”至少在儒家传

统看来是有其道德正当性的。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在本次修改稿中没有就“道德伪善”再进一步做出更大篇幅的阐释，只在讨论中隐晦地补充了一点简短的判断：尤其是道德判断与道德决策之间的分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人们身上潜在道德伪善的一面，即使是自我报告的善行也达不到自己所声称应当做出的行为（傅鑫媛 等, 2015; 李杭州 等, 2021）。

**11. 本文主要采用文本阅读-情境想象的方法，然而，该方法可能与现实行为有所差异，建议作者增加相关局限性的讨论。**

**回应 11：**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亲亲相隐”研究的生态效度确实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研究中的被试多报告了相对较高向有关部门举报的道德决策意向，我们不知道他们的选择究竟能否真的在现实生活中兑现。不过从各组间对比来看，被试在熟人犯错时确实做出了更少检举的决策，这说明“亲亲相隐”是真实存在于人们的道德结构中的，我们大胆推测这一效应在真实生活中只会更强。未来研究中还需要再深入考虑如何进一步提高生态效度，我们在正文最后对这一局限性进行了讨论与展望。



## 审稿专家意见与作者回应（第二轮）

该文章探讨了中国人对“亲亲相隐”或大义灭亲所持有的复杂态度，有着一定的应用意义，仍存在一些可以优化的问题，具体问题如下：

作者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细致审阅。在本次修改稿中，我们针对专家指出的以下问题做出了逐一订正和修改，详见正文，具体如下：

1. 摘要中提到【研究揭示了中国人对“亲亲相隐”或大义灭亲所持有的复杂态度，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道德认知中的关系偏好。】为何题目中只指出亲亲相隐？

回应 1：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因为“亲亲相隐”和大义灭亲一般被认为是对立的两极，所以在原稿中以“或”字并举。考虑到研究旨趣，结合审稿专家意见，我们在本次修改稿中删除了摘要中“大义灭亲”的表述，明确“亲亲相隐”在本研究中的核心地位。

2. 引言部分并未提出实验的假设

回应 2：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在本次修改稿中，我们参照意见于引言最后一段增加了本研究的总体假设，详见正文，具体如下：

根据以上证据提出总体研究假设：（1）人们在第一人称下相对第三人称更不认可“亲亲相隐”的道德正当性；（2）人们在第一人称下相对第三人称具有更低“亲亲相隐”的决策意向。

3. 研究一部分对于两种视角下的两种道德认知测量描述并不清晰，可更改符号或句式进行重新描述

回应 3：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参照意见，为了能够向读者更准确传达道德认知的测量手段，我们在本次修改稿中将相关描述中的符号修改为：

你在多大程度上【应该/会】向有关部门举报父亲的错误行为？

4. 【然后同样检验错误严重性的调节作用】多余符号

回应 4：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细致审阅，我们订正了相关错误。

5. 【本研究中通过在情境材料中设置不同社会关系下的违法犯错行为人（自己的父亲、同单元楼的好友、隔壁栋的住户），以对社会关系远近进行操纵】分类依据

回应 5：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与 Soter 等（2021）研究中采用的社会关系操纵类似，我们在此处的操纵是在结合问题情境的基础上、基于客观的社会关系远近做出的自变量分类：亲人-好友-邻居。其中“亲人（父亲）”和“好友”两者与被试间的关系远近是比较明确的；而为了确保邻居的关系不至于过于密切，我们将其描述为“隔壁栋的住户”，给被试

营造出几乎是“陌生人”的社会关系。因此，我们认为本研究中采用直接的客观指标：父亲→好友→陌生人，相应的社会关系远近对被试而言已经足够明确。

也有研究者会另外增加社会关系主观指标的测量（Berg et al., 2021），这是对客观关系操纵的一种补充，未来研究有必要进一步丰富相关操纵方式和测量指标的选用。

6. 【此外，因为违法犯错行为人与被试的亲近关系，个体自我建构类型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干扰变量，所以本研究还增加了双元自我建构的测量。】文献支撑

回应 6：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根据意见，我们在本次修改稿中补充了相应的文献支撑，详见正文，具体如下：

此外，因为违法犯错行为人与被试的亲近关系，持有更高互依自我建构的被试可能更倾向于去保护亲人不受伤害（Berg, 2021; Cross et al., 2000, 2011），所以个体自我建构类型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干扰变量，故本研究还增加了双元自我建构的测量。

7. 【尽管对“亲亲相隐”的道德正当性判断具有跨视角的一致性，但人们在第一人称的当局者视角下具有相对旁观者视角更低袒护亲近者的决策意向。】适当断句和重新调整、增加文章的可读性

回应 7：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参照意见对结论进行了如下调整：

综上，本研究发现：（1）在第一和第三两种人称视角下，人们对“亲亲相隐”的道德正当性判断具有跨视角的一致性；（2）相对第三人称的旁观者视角，人们在第一人称的当局者视角下具有更低袒护亲近者的决策意向。



# 审稿专家意见与作者回应（第一轮）

## 一、审稿专家 1 的意见与作者回应

本文选题重要、视角新颖、具有本土理论的开创价值，但是存在一些核心问题，具体如下：

1. 为何引入第一视角和第三视角的差异，引言和文献综述中并未充分论述；

回应 1：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参照意见大幅扩充了文章的引言部分，并结合意见 2 中提到的理论框架和逻辑推导问题，细致论述了引入第一和第三两种人称视角来考察“亲亲相隐”问题的必要性和理论意义，详见正文，具体如下：

而不同于电车难题这种“规则中心”的道德困境（Thomson, 1985），蕴含丰富社会关系背景的“亲亲相隐”问题难以避免自我中心的影响（Bocian et al., 2020），这会导致怎样的道德认知差异却并不明确。如在 Berg（2021）基于美国-日本被试群体的跨文化考察中，受互依自我建构主导的日本被试却在亲人违法时，报告了相对美国被试更低的“亲亲相隐”倾向，这是源自文化差异还是当局者视角的潜在自我中心偏差仍需检验。不过，第一人称也能够弥补我们的道德认知局限，其典型便是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在第三人称下形成绝对公平原则的基础上，以第一人称视角引入了对不利地位者权利的保护这一基本原则（Rawls, 1971, pp. 302-312）。因此，综合第一人称（当局者）和第三人称（旁观者）两种道德认知视角及其潜在差异，能够更为全面而深入地把握人们对“亲亲相隐”的道德认知特点。

2. 文献综述到理论框架到实验假设，逻辑推导不是特别严密，未能指出前人研究的局限和不足在什么地方，从而指明本研究的开创意义是什么；

回应 2：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结合意见 1，我们在本次修改稿中进一步完善了文章引言的理论框架和逻辑推导，丰富了相关前人研究及其局限性的论述，并指出了本文的切入点和独特意义，详见正文，具体如下：

当前已有研究关注到当局者（受害者）视角对“亲亲相隐”中道德认知的影响（见：邓晓芒, 2010b; Berg, 2021）。如在对“亲亲相隐”的判决性思辨实验中，邓晓芒（2010b）引入的第三方受害者视角：“如果你的亲人无辜被杀，你是希望一个六亲不认的法官来判案呢，还是希望一个与本案主由亲戚关系且一贯包庇自己亲属的法官来判案？”这里受害者视角的情境代入，从道德判断层面驳斥了“亲亲相隐”的道德正当性。还有研究关注到类似舜帝被父亲所迫害的情况（《史记·五帝本纪》），结果发现在亲人违法行为危害到自身权益时，美国被试会相对更倾向于检举揭发，而日本被试则更倾向于“亲亲相隐”（Berg, 2021）。这些研究关注到人们在受害者-旁观者两种视角下的道德认知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亲亲相隐”问题中价值冲突的复杂性以及人类道德认知对情境的敏感性（Schein, 2020）。

不过，其中采用的旁观者（observer）视角却并不“旁观”，仍是从作为亲人的第一人称出发去做出道德决策（Berg, 2021）。而在相应的决策机制考察中，人们袒护亲人的更高决策意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想要维护自身利益（Weidman et al., 2020）。采用 ERP 技术的研

究也发现，他人的不道德行为会导致被试在早期认知加工过程中产生期望违背（expectancy violation，以 P300 为指标），其中亲近者犯错所导致的期望违背显著高于生疏者，但期望违背对道德决策的影响却因关系亲疏而朝向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Berg et al., 2021）。这是因为，两种情况下人们的注意朝向不同：对亲近者犯错的注意朝向亲近者本身，而生疏者犯错则朝向生疏者的错误行为（Berg et al., 2021; Forbes & Stellar, 2022）。可见，第一人称的当局者视角天然地隐含着自我中心偏差，但这一偏差是朝向“亲亲相隐”还是大义灭亲？

3. 研究一和研究二采用单一道德情境材料，得出的研究结论不能让人信服，道德心理学的研究范式均要整合多个道德情境：

回应 3：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总体来看，本研究主要聚焦于“视角差异”：认知视角对“亲亲相隐”中道德认知的主效应。围绕这一主效应，通过 3 个平行研究分别考察了主体（社会赞许性、自我建构）和情境（问题严重性、情境类型、社会关系远近）两个方面的干扰因素在其中的潜在作用。结果表明，上述视角差异未受社会赞许性、自我建构和情境类型的显著影响，仅在亲近者违法犯错情况下存在。

如审稿专家所言，多类型的道德情境确实对于道德认知研究非常重要，这决定了相应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和推广性。实际上，设置研究三正是为了弥补研究一和研究二采用单一道德情境的局限。从上述意义上来说，本文的 3 个平行研究互相提供了对“亲亲相隐”中道德认知视角差异的稳健性检验，所以其中道德认知分离的视角差异可谓是非常稳健而可靠的。

4. 研究三试图推广到不同道德情境，但是个人认为探讨亲亲相隐和大义灭亲的具象社会情境应当区分违反道德还是违反法律两种不同性质的范畴，应当分类讨论，不能混为一谈：

回应 4：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在传统中，“亲亲相隐”主要是围绕违法犯罪问题展开的，相应的道德原则和法理学原理也是中国哲学和伦理学界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而当从道德心理学的视角探究这一问题，则对其中道德领域或范畴的划分便十分重要。

现有研究中，只有 Weidman 等（2020）在研究 1c 中考察了道德领域作为一个被试间变量的作用，结果发现在盗窃（theft）和性骚扰（sexual harassment）两种情况下，人们都报告了“亲亲相隐”的道德决策意向。

我们在研究三中也考虑了道德领域的作用，但采用的是不同的道德领域划分思路，即违背公德（偷摘并蒂莲）、违法（疫情违法）和犯罪（肇事逃逸）三种领域的情境问题，这样的道德领域分类和相应的情境设定相对更贴近日常生活，有助于提升研究的生态效度。

在数据分析中，我们在将 3 种情境作为一个自变量进行整体分析之外，还在 3 种情境下分别做了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表明道德认知的相应视角差异在 3 种情境下是一致的。

5. 讨论部分未能提供儒家文化以及剧烈文化变迁的解释框架

回应 5：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亲亲相隐”从《论语》中萌芽，到汉代形成法律规

定，直到民国时期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有所继承。但在新中国成立后有所中断，直到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才再次被学界和社会议题所重提，最近是在 2012 年第二次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了人们拥有不指证重要亲属的法律权利。

参照审稿专家意见，我们在本次修改稿中简单梳理了“亲亲相隐”的历史发展，并从近代以来的文化和法律变迁指出了“亲亲相隐”在人们道德认知中的矛盾性存在，进而将研究落脚到“亲亲相隐”中道德认知的视角差异。详见正文，具体如下：

“亲亲相隐”作为一项道义准则和法律规定自汉代初步确立，最迟到《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仍有其思想继承（范忠信, 1997）。新中国成立后，大概在 90 年代就开始有学者呼吁赋予亲属刑事豁免权，到 2007 年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提交了《关于尽快恢复亲属容隐制的建议》（李拥军, 2014）。几乎同时期，中国哲学和伦理学界围绕“亲亲相隐”进行了一场持续十余年之久的争论（邓晓芒, 2010a）。终于，201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第二次修正增加规定了人们拥有不指证重要亲属的法律权利，一定程度上从立法层面回应了学界和社会议题的纷争（王剑, 2017）。以上种种，显示出“亲亲相隐”这一儒家传统道德观在近百余年中西文化交融背景下的剧烈变迁，其在当代社会生活中仍具有顽强的文化生命力，与大义灭亲同时存在于个体和社会价值体系中。

相应地，人们对“亲亲相隐”或大义灭亲的道德认知便也并不稳固，在一定程度上敏感于所采取的认知视角。已有研究关注到...

## 二、审稿专家 2 的意见与作者回应

1. 在实验一中，被试的筛选是通过注意检测题，请详细说明是什么样的检测题以及筛选标准。

回应 1：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对于注意检测题，我们是在呈现研究中采用的情境材料之后，以单选题的形式请被试报告相应情境的细节信息，如：“在材料中，是谁开车撞人之后跑掉？”其中，研究一和研究二中选择错误选项的被试全部被剔除；研究三中的 3 种情境对应了 3 个注意检测题，只有 3 个题目全部正确才会被纳入数据分析。在本次修改稿中，我们按照审稿专家意见补充了相应被试筛选的详细说明。

2. 实验一中，为什么将错误严重性作为调节变量？错误严重性是否可以考虑作为一个自变量进行操控？惩罚严重性为什么可能是混淆变量？

回应 2：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对于感知严重性和惩罚严重性的作用，我们的初始思路是将惩罚严重性作为潜在的混淆变量纳入探索性考察，推测感知严重性应正向预测举报意向（错误越严重，越倾向于举报错误），而惩罚严重性应负向预测举报意向（惩罚越严重，越不愿意举报亲人）。但结果发现，两者存在中等程度的相关（ $r = .49$ ），感知严重性正向预测举报意向（ $\beta = .32^{***}$ ），惩罚严重性也正向预测举报意向（ $\beta = .38^{***}$ ）。

我们更早期的一些探索性研究也发现，现实生活情境问题中的错误严重性和惩罚严重性几乎无法有效分离（在不违背现实合理性的情况下，实验操纵的惩罚严重性也未能观

测到主效应），这可能是因为惩罚严重性的背后天然地隐含着错误严重性，从而导致惩罚严重性潜在的负向预测作用直接被错误严重性的作用所掩盖了。因此，我们在数据分析中没有将惩罚严重性作为一个重要变量进行考察，而是将其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处理。

之所以将错误严重性作为调节变量，是因为错误严重性是“亲亲相隐”问题中最直接的情境因素。对于错误严重性的操纵，以往研究的做法是设置多种道德情境，然后以评分者评定的分数进行分组，作为高-低严重性组。但其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两种严重性下的问题情境并不相同，无法排除道德领域的混淆。所以我们在研究中退而求其次，以被试主观感知的严重性作为错误严重性指标。此时的感知严重性测量可能会受自变量操纵的干扰，我们用统计分析排除了这一潜在解释：感知严重性未受认知视角的显著影响（ $p = .50$ ）。

3. 实验一中，作者指出，这是一个 2\*2 的实验设计，其中一个自变量是道德认知类型（道德判断和道德决策），这个自变量是如何进行操控的？需要再描述的详细一些。

回应 3：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在 3 个研究中，道德认知类型（道德判断、道德决策）都是作为一个被试内自变量进行相应指标的测量。这是因为，“亲亲相隐”问题至少体现为两个方面：①人们是否应当“亲亲相隐”，对应于道德判断；②人们会不会“亲亲相隐”，对应于道德决策。所以我们在研究中同时考察了这两个道德认知指标。

同时，Soter 等（2021）发现“应然”（should）的道德判断和“实然”（would）的道德决策之间存在分离，即人们尽管在很大程度上认为应当举报亲人的违法犯错，但报告了相对更低的举报意向，而且这一分离在组间设计和组内设计下都能观测到。

所以我们参照 Soter 等（2021）的组内测量，直接将相应的 2 个测量问题在一个页面上同时呈现，并作为被试内自变量进行分析处理。这也使我们得以能够考察第 3 个道德认知指标：道德认知分离（即道德判断减去道德决策的差值，反映了出于私心的袒护意向）。

在本次修改稿中，我们按照审稿专家意见补充了相应测量的详细描述。

4. 在实验一中，作者认为惩罚严重性作为潜在的混淆变量需要进行控制。在实验二中，为什么没有继续将这个变量进行控制？

回应 4：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因为我们是将惩罚严重性作为情境中一个潜在的混淆变量进行探索性考察，其并非本研究的核心关注点。而研究一的结果表明，惩罚严重性与认知视角之间交互作用不显著，这意味着“亲亲相隐”中道德认知的视角差异并未受惩罚严重性的显著影响。所以在研究一中排除了这一情境因素的潜在混淆之后，考虑到研究开展的经济性（3 个研究都已是三因素设计），便未在后续研究中继续作为混淆变量进行控制。

5. 建议作者加强对本研究理论贡献的阐述。

回应 5：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综合两位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调整并充实了引言和讨论部分的阐述，从研究意义、现有研究的局限与不足、本研究切入点和研究结果的解释等方面进一步丰富了本研究理论贡献的论述。详见正文。